

# 序

## 契合历史语境，探求古人著述之心



1

序

刘畅教授的《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即将出版，作为老朋友，感到十分高兴。

我与刘畅教授的相识，和多数学者间的熟识一样，始于学术会议。记忆中，我们大概有两次面见，其余时候就是以文字通信联系为主了。见面虽然不多，但我觉得我们是君子之交，也是倾心之交，彼此都觉得可以相互信赖。刘教授是谦谦君子，端正朴质，低调，但让人过目不忘，我觉得与这种类型的人打交道特别容易、舒服。刘教授学术根底好，长于思辨，在政治思想史和古代文艺思想史方面卓有建树，这部著作恰是在他所长的领域积年所得，所以我对这部书有很高的期待。

据我所知，此著是刘畅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关于他的研究和这本书的写作，我有一些了解，也在出版前，阅读了书稿的大部分。我有一些想法，愿与诸君分享。

该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著述思想，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也具有新的研究价值。在著述领域，我们以往比较习见的是各种冠以“思想”之名的

学科思想，比如“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创作思想”等。这是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在学科分类基础上产生的知识分类。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些所谓分科的“思想”能否称为“思想”？二是它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的著述思想内核？关于前者，我以为，“思想”应该是层级更高、追问更深、涵括更广的系统性思考，它不同于具体的分支理论。换言之，著述思想应该是囊括了哲学、史学、文学等各科著作在内的总体著述思想。在这个角度，我非常认同刘畅教授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中国古代著述思想虽庞杂，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寻找古人关于著述思想的普遍共性，一一开展对古代著述思想的个案研究，然后集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系统，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整体思考框架”。关于后者，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对著述有各种表述：“著”“作”“撰”“述”“述作”“撰述”等。这套话语，囊括了中国古人对各类著作撰述的称呼。研究这套话语，并通过这套话语研究中国古人的著述思想，更能够贴合古人的语境，进而探求古人的著述之心。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有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具有新的研究价值。

关于著述思想，古人有很多论述，我觉得章学诚所说的“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最得我心。若整体考察它，应该包括著述的动机、著述的目的、著述的价值、著述的内容等。刘教授此著，虽不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体系严整的著作，但无疑是一部富有学术个性的著作。与一般四平八稳的概论性著述相比，我更喜欢刘教授这部专题式的研究著作。

该著不追求齐全，以创新性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体例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从体例上看，作者以某种具体的理论和问题为纲，而不是以时代、著述类型或思想类型为纲。作者所选取的若干论题，在过往的研究中，是将其视为概念和范畴的，很少有人从思想的层面对其内涵和历史文化等外延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角度和论题，虽然看似是某个具体的理论范畴或概念，但刘教授实际上是从思想的高度去考察的。比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庄子三言”“经国之大业”，这些论题，不是新的问题，过往学者已有丰富的研究，但刘教授的研究，别出心裁，从思想的层面，讨论“立言不朽”与“立言为公”



的关系，研究“述而不作”与古人思维模式的关系，探讨“庄子三言”作为一种思想修辞的表现，等等。这样的研究角度较以往的研究，显然视野更开阔，更深入。它体现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传统的著述理论，不限于一种概念和范畴，而是与作者的“心术”特征、著述动机、心路历程以及更宏阔的历史背景、知识背景、学术渊源、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从而更周密地研讨其内涵与外延，对著述思想进行多学科的融通互证。

正因为有了新的体例和方法，该著对一些重要的著述思想有了比前人更深入的探讨，比如对庄子“三言”的解说，讨论寓言的隐喻性，认为这是庄子深思熟虑的著述方式的选择；讨论“重言”，认为是真言的多维表述；对“卮言”，认为体现的是一种整体言说的风格及思维方式。并且，该著从隐喻与思想修辞的角度对“三言”进行更深入的开掘，这些都是饶有新意的解说。对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之说，作者结合气候、物色之变化进行讨论；论述曹丕的著述思想，以“悲凉、速老、不朽”为切入点，梳理其著述思想的内在逻辑。这些论述，均胜意迭出，引人遐思。刘教授对多种著述思想展开多学科的观察，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史学、哲学、文献学、地理学、宗教学、修辞学、美学等。因此，该著在研究体例和方法上的创意，带来的是个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深刻变化。

阅读中，我还发现刘教授特别注意开掘某种思想的独特性，如研究曹丕和萧统的著述思想，注意到它们与物色的关系，作者提出“物候审美”的概念，分析了古人“春秋优于冬夏”的物候感知，认为悲凉是“北方物候之花”，这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发现。此外，作者还注意到了著述思想的时代性特色，研究曹丕的悲凉意识，将之与楚辞的悲秋和建安的悲凉相联系，从“天问精神”到“宗南意识”，从人的“速老”到著述的“不朽”，在时光的流逝中，把握著述人心态的变化，提出了以往学者较少关注的课题，非常具有学术个性。在研究宋代的著述思想时，刘教授注意到它的二元对立又互补的特征，也是独特的思想发现。

此外，该著虽然是专题性的古代著述思想的研究，但并不是割裂的封闭式研究，相反，它体现了宏通的历史感和古为今用的责任感。论著所涉及的范围，从先秦至两宋，跨度大，但以思想为纲，以问题为目，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中国古

代影响比较大的思想范畴，所以重点突出，在论述分析中，又展示了时代性。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唯务折衷”等，均是在古今都有重要影响的论题，作者在研究中，对其思想史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开掘，并注意古今结合，挖掘其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如有关“立言不朽”与“立言为公”的论题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鲜明的现实价值。作者在论述庄子“三言”问题时，注意到其思想修辞的特性，对今天的语言运用也有指导意义。因此，该著虽是一部研究古代著述思想的著作，但也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

总而言之，刘畅教授此著立意高远，视野宏通，材料翔实，论证周详，洵为不多见的富有创意的学术著作。

为友人著作作序，不免美言，也不免挂一漏万。限于水平，未能识珠之处所在多有，刘教授嘱我作序，当不会怪我。期待像刘教授在后记中所言，古代著述思想的系统研究会有来哲进一步推进，以飨读者。

走笔至此，抬头望见窗外怒放的木棉花，这是广州市花，一朵朵缀在光秃秃的枝干上，色泽殷红，人称英雄花。难道是因为它殷红似血才有此称的吗？我不知道。恍然想起这个庚子的冬春，“新冠病毒肺炎”虽然不见血迹，但“封城”“恐慌”“疫区”“医护”“呼吸机”“ICU”“ECMO”这些字眼，带给我们的创伤，似乎比殷红的血还更像血迹。庚子，疫情，屏居月余，谨记于此。

是为序。

孙立

庚子初春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 目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立言不朽”与“立言为公”辨析 / 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9

第二节 “死而不朽”的相关文献梳理 / 11

第三节 臧文仲其人其言 / 19

第四节 “三不朽”中“公天下”的价值取向 / 24

第五节 公私观念：文字学及相关先秦文献的梳理 / 32

第六节 公私观念：从身份称谓到价值判断的嬗变 / 40

第七节 立言不朽：原始义、引申义与外延泛化 / 48

第二章 “述而不作”：著述思想与思维方式 / 56

第一节 “述而不作”溯源 / 56

第二节 古人对“作”的敬畏心态 / 68

第三节 “作”之难：圣化原创性 / 73

第四节 “作”之难：心智神秘性 / 80

1

目  
录

- 第五节 “作”之难：立言为公性 / 86
- 第六节 “述而不作”：思想力与教育理念 / 93
- 第七节 “述而不作”：文化基因与历史影响 / 107
- 第八节 多元视角与异见并存 / 112

### 第三章 《庄子》“三言”：著述方式与思想方法 / 117

- 第一节 寓言隐喻：庄子深思熟虑的著述方式选择 / 119
- 第二节 “重言”辨析：真言的多维表述 / 140
- 第三节 《庄子》“卮言”辨析：一种整体言说风格及思维方式 / 156
- 第四节 寓言隐喻与思想修辞 / 196
- 第五节 寓言假说：作为一种思想修辞 / 213
- 第六节 比喻延伸：作为一种思想修辞 / 225

### 第四章 悲凉、速老、不朽：曹丕著述思想的逻辑 / 237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237
- 第二节 物候审美：春秋优于冬夏的分析 / 240
- 第三节 楚辞悲秋与建安悲凉 / 264
- 第四节 曹丕创作中的悲凉情调 / 283
- 第五节 速老与不朽：曹丕著述思想的内在逻辑 / 295
- 第六节 从对刘勰的影响看曹丕著述思想以论为重 / 306

### 第五章 刘勰“唯务折衷”著述思想与中观思维 / 321

- 第一节 中庸之道：处世态度与思想方法 / 321
- 第二节 亦南亦北：刘勰的社会角色之一 / 328





- 第三节 士庶之间：刘勰的社会角色之二 / 335
- 第四节 若即若离与“唯务折衷” / 341
- 第五节 中观思维之于刘勰：发现与创新的起点 / 351
- 第六节 中观思维：两个已知与一个未知 / 358
- 第六章 萧统著述思想的审美角度观照 / 364**
- 第一节 审美态度与萧统著述思想 / 365
- 第二节 萧统的季节性审美意识 / 370
- 第三节 萧统与广义“物色”态度 / 373
- 第四节 “物色”“娱玩”审美态度在选篇标准中的渗透 / 377
- 第五节 《风骨》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批判 / 384
- 第七章 二元矛盾互补：宋型文化与宋人著述思想 / 399**
- 第一节 宋型文化的社会背景分析 / 400
- 第二节 复杂矛盾、多变命运与双重人格 / 420
- 第三节 宋人二元互补的创新智慧 / 432
- 第四节 学问功力与兴趣妙悟 / 452
- 第五节 定法与活法 / 458
- 第六节 忌俗为雅与以俗为雅 / 469
- 第七节 宋人心态：向内收敛与向外辐射 / 479
- 第八节 婉约、豪放审美现象并存 / 486
- 后 记 / 496**

# 前 言



本书尝试将“著述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展开论述。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使用文字符号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人作为一种高级智慧动物的类本质；而利用文字符号进行有意识的著述活动，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承袭、创造、传播精神财富的文化行为。个体存在短促，而群体生命无穷。一个民族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生存与繁衍，主要通过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著述活动来实现。中国古代著述丰富，文献浩如烟海，与之相应的是有关著述思想的庞杂纷繁。由于自周秦以来的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所以，从中孕育出来的著述思想也与之相应地具有贯穿历史的同等稳定的特性。中国古代著述思想虽庞杂，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寻找古人关于著述思想的普遍共性，一一开展对古代著述思想的个案研究，然后集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系统，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整体思考框架。梳理与剖析古代著述思想，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思路。

著述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著述这种文化行为的看法，其中涉及一些问题。例如：著述的动机及目的为何？著书立说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它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对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著与述即创新与承袭的关系



是什么？述而不作与作而不述，二者各有何优劣短长？各种著述思想的产生、发展、延续，有无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始终的规律？如果有，它又具体是什么？如果有，决定这种规律的外部环境条件又是什么？

目前，由于对著述思想的研究尚未独立开展，学界产生了不少困惑。例如，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在文学史、学术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等著作中都被提到，但它究竟属于什么思想，却引起了广泛讨论。罗宗强先生就曾指出：“这句话，常被当作用文章于治国来理解。这样理解，曹丕的文学观，当然就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了。其实，这样理解是不确的。……曹丕这话的意思，是把文章提到和经国大业一样重要的地位，以之为不朽之盛事。”<sup>①</sup>这里显然是把曹丕之言作为文学思想。而刘跃进先生则认为：所谓“文章”并不等同于文学，如诗赋、散文等，认为“他所说的‘不朽之盛事’是要靠著述留名，特别是经典著述”<sup>②</sup>。这样的理解，显然又异于将其视为文学思想，已很接近于将其视为著述思想了。这种仁智互见的讨论，引导着人们从另一角度思考问题：如果不把曹丕此言当成文学观或文学思想，而是当作著述思想，问题似乎更容易说清楚。笔者以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一种著述思想，而非文学思想或史学思想，汉魏之际流行的“速老”优生心态是其生成的精神土壤，曹丕的这一思想并非对“立言不朽”观念的简单重复，与建安时代士人速老心态有关。研究这种心态的最后落脚点应是著述思想，即著述所体现的思想观念，而非史学思想或文学思想。

很明显，“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创作思想”等称呼，并非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词语，而是现代汉语兴起之后的概念，从语词意义上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而“著述”，则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sup>③</sup>《礼记·中庸》：“父作

①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页。

②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1页。



之，子述之。”<sup>①</sup>《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来者。”<sup>②</sup>有时兼指二者，合而言之，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sup>③</sup>“著述”又称“述作”，曹丕《与吴质书》：“德琰常斐然有述作意。”<sup>④</sup>所以，在特定研究语境下，以“著述”代替“史学”“文学”“创作”等，无论是从汉语语言形态上，还是从概念范畴上，或是从历史认识上，都更接近与符合历史原貌。随着古代文化研究的细化，笔者感觉十分有必要将著述思想从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或学术思想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著述思想所关注的应该是问题的共性，这种共性被总结和提炼出来之后，对某一特定的著述活动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受哲学、史学、文学、文献学及其他学科制约和影响，但又不完全与其等同。换言之，它包含史学、文学、哲学、文献学等理念，但其本身并不只是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文献学思想或学术思想，而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著述这种文化行为的解释和说明。

著述思想，与文献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文献是著述的载体，但“著述思想”本身却不是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文献学主要对各种著述的成果——文献——进行实用技术性的疏通和整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和校勘等方面的具体操作环节，而著述思想显然是一种抽象理论形态。此外，著述思想与文献学理论也有区别。文献学理论是对文献学各个分支长期实践的总结概括，对后人的此方面工作具有操作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如校勘学理论，散见于刘向的《别录》、郑樵的《通志·校讎略》、叶德辉的《藏书十约》、陈垣《校勘学释例》、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讲述的都是如何校讎的具体方法和经验，所表现的是一种实用操作精神。而著述思想则是要对著书立说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总结，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哲学理论形态。开展对它的研究，可以补

①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6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

③ 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2页。

④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2页。

充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的不足。在目前的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从历史的角度叙述源流、从整理的角度讲述操作环节者居多，而像章学诚《文史通义》那样贯通古今、高度概括者则罕见。

应该看到，除了以上所展示的交叉现象外，“著述”这一词语还仅用于某一专门领域，如特指史家著作，章学诚就曾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sup>①</sup>就史籍而言，他又将其分为“作”和“述”两类，章氏称之为“著述”与“比类”，其云：“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即撰述——引者注）与比类（即记注——引者注）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而不相妨害。”<sup>②</sup>他认为撰述较记注难而可贵。因为撰述应当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组织，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著作活动。而记注只不过是原始资料的记录、整理、选辑、汇编而已。他这种区分的理论根据是，学问分为“藏往之学”与“知来之学”两种：“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sup>③</sup>这里所论，尽管发端于史学，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史学、史籍的领域，如“藏往之学”与“知来之学”，实际上已经涉及“述而不作”中的“述”与“作”的关系问题。

研究著述思想，应以思想和问题为纲，而不以时代和人物为纲，即凡是能构成一种思想范畴并基本能够贯穿古代社会始终的，就构成一个研究命题。在中国古代社会这一超稳定的文化系统中，由于社会土壤和文化气候大致相同，一种思想有其历史延续性和反复性，其承传和影响往往规律性地表现出来。所以，要弄清各种著述思想产生的规律性，即什么情况及背景下产生何种著述思想及其文化意义。以思想和问题为纲的依据是，一种著述思想范畴一旦形成，往往有其历史延续性，涵盖面极广，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庄子》“三言”、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18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34页。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0—71页。



曹丕“文章经国”等。以“述而不作”为例，它如同“立言不朽”一样，是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重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产生了极大的历史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是君权主义与王权思想；从风俗制度角度看，是庞杂烦琐的礼仪规范；从哲学思想角度看，是“太极”“天理”“道”“天道”“气”等抽象、绝对、终极之本体；从伦理哲学角度看，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从时间顺序看，是三皇—五帝（大同）—三王（小康）的儒家道统秩序；而若从著述思想上考察，最具权威及影响力的则是“述而不作”的思想，其巨大影响力几乎贯穿了孔子之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因而，应将“述而不作”思想视为一个研究对象。

以思想和问题为纲，研究著述思想还有一种情况：某一学者本人并未提出某一明确的概念和范畴来概括他的著述思想，但其有关著述的思想又确实是有价值并自成体系，这就需要我们从其基本材料中选择一个关键概念以统摄其著述思想，例如刘勰的“唯务折衷”著述思想。这一成词见于《文心雕龙·序志篇》：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sup>①</sup>“唯务折衷”，即调和对立双方，取其中正，持论周洽，无所偏颇，可视为刘勰分析问题的一种原则性方法，《文心雕龙》通篇几乎都留下了这种思想痕迹。此外，还应注意到：刘勰的“唯务折衷”是中国传统中庸思想在著述思想方面的表现。传统中庸之道的一些思想原则，兼有人伦行为准则和艺术审美评价的双重内涵，因而天然地具有学术思维的特征，即中观思维。但中庸思想与中观思维不是完全对等、重合的，从中庸思想的普遍哲学原则到中观思维的具体学术方法之间有一个思维加工及模式转换的中间环节，这方面的代表是刘勰的“唯务折衷”的著述思想方法。这样，我们不仅把刘勰的这一著述思想纳入了传统中庸思想的范畴，还从中庸思想中触及了中观思维，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本书承认中庸思想与中观思维具有极强的同构互释性，但不是在哲学思维和处世态度的意义上，而是在学术思想的方法意义上使用“中观思维”一词。本书所谓“中观

<sup>①</sup>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7页。



思维”，是指一种善于融通研究对象的两端、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据此，本书把刘勰的“唯务折衷”作为一个分析个案，说明中庸思想有一个从哲学思维、处世态度到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刘勰的手中完成的；并力图揭示：“唯务折衷”中所体现的中观思维倾向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它善于在两个已知之间发现一个未知的思维中间地带，而这个中间地带往往就是创新型思维的起点。

以思想和问题为纲，研究著述思想，还应看到：思想和观念形态并不只是抽象的存在。探讨一种思想的形成，除了作者直接展示的成型的文献材料之外，还要注意到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例如刘勰的“唯务折衷”思想的形成。

此外，以思想和问题为纲，还要注意对某种著述思想的延伸思考。依笔者之见，研究古代著述思想固然是梳理、总结古代文化的精华，但也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从思想脉络和思维规律的角度看，古代著述思想与现代思维不无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是曲折、间接的。本书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笔者曾指出，“述而不作”作为一种著述思想和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将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这突出表现在传统文化对于创新的理解上，这种延续和影响贯通古今。从这种意义上讲，“述而不作”又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影响至今不衰。一种理论范畴一旦形成，并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惯性，并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从直观常识上看，“述而不作”的著述观念含有“真理”颗粒，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这种治学态度，有严谨、务实、不尚空言、基本功扎实的优点，也有守旧、保守、不思进取导致思想僵化、缺乏创造性思维的缺陷。尤其考虑到“述而不作”的首倡者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统治中华意识形态近两千年，成为一种著述理念上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渗入民族肌体内的“文化基因”，这种影响就更不可低估。

目前，就国内外汉学界而言，尚无学者把“著述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也无学者提出“著述思想”这一概念，并以此为线索展开相关的、专门的独立研究。在国内学界，“著述思想”尚未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



象。可以说，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于感性的、零星的、分散的、片段式的状态。故亟须整合，以“著述思想”为核心概念，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总而言之，“著述思想”关注的应该是一种理论形态，即经过总结的系统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性认识。但由于中国文化思维重视直观实用的特点，即倾向于直观感悟和经验常识而轻视逻辑思辨和理论总结，大量有关著述思想的观念如同零金碎玉一样，散落理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亟须开展一些梳理、归纳和概括的工作。这对文化史、学术史及文献学的理论研究都有建设性意义。要之，著述思想包含著述和思想两个方面，就著述而言，它涉及一些传统文献学繁杂已知的知识；就思想而言，它又有自身的创造能力在内，含有探索未知的因素，它与文学、史学、哲学及学术思想联系密切。可以说，它是一种介乎以疏通整理、编述抄纂为主的文献学，以思辨创新为主的文学，以及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的一个门类。相关文献目前尚未被很好地系统挖掘整理，故其本身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

如果说创新之处，本书或有以下几点：首先，其基本思路是把“著述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来看待，并据此线索和思路进行梳理和研究，试图将著述思想从文学、史学、文献学中剥离出来，挖掘总结古代著述思想，为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本身就含有创新因素。其次，本书试图寻求著述思想在传统学术文化中一以贯之的精神痕迹，将其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传统文化精神来对待，这样不仅厘清了一个个具体的著述思想，也会对传统文化有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再次，本书不是简单地“还原”和“叙述”某一种著述思想的范畴，而是试图将其与其时代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想的某一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例如讨论“立言不朽”时和“立言为公”结合起来，讨论“述而不作”时和传统文化对原创的理解结合起来。最后，由于把古代著述思想按照范畴进行梳理和分析，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唯务折衷”等，本书不仅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主要范畴，还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和佐证。

笔者希望本书不仅可以为理解传统文化的著述精神提供一种新的角度，也可为古代文学、文论等专业开设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相关课程提供一本可以利用的教材。

## 第一章 “立言不朽”与“立言为公”辨析



“三不朽”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在评价和征引这一思想时，学界已经形成一种认识泛化和思维惯性，使得“三不朽”成为一个无须进一步剖析的常识性思想范畴。在它面前，似乎只有“获取人生永恒价值”“注重主体精神的永存”这一种解读方法。一说到“三不朽”，就要与个体人生价值观相联系。这种认识显然不全面。没有回到其产生的原始语境里去具体理解问题，是造成这种认识上偏差的原因之一。笔者将回到产生“三不朽”的原始语言环境，逐一梳理、分析组成它的各种精神元素，希望不仅能得出与现行主流认识不同的结论，而且可以对先秦的公私观念进行重新梳理和认识。

此外，“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朽”是中国古代较早的、成系统的、有明确概念内涵的关于著述思想的论述，其排名在“立德”与“立功”之后。这种排序不仅仅显示出世界观和价值判断的先后顺序，还昭示着“立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立德”和“立功”的影响，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将此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清楚明白：“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sup>①</sup>即使同是“立言”，也有价值判断上的高低优劣，如中国图书四分法中的经、史、子、集的排序，其中的关键在于“立言为公”，即倡导一种群体、社会价值观高于个人思想、情感表达的“为公”的著述思想与观念。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三不朽”说，影响至巨，绵延至今。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研究者的精力和目光所聚焦的是它所蕴含的个体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而对“三不朽”说产生的特定时代和语境背景以及由此限定的思想内涵往往不够注意。在“三不朽”说面前，人们似乎只有从抽象的积极意义上引用它这一种解读方法，也似乎只有肯定其个体生命价值追求这一种思维方式。“三不朽”，似乎已成为古代个体人生价值观的同义语。如有学者撰文《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第一节标题即为“最早的人生价值思想——三不朽”，其云：“中国古代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讨论，最早的材料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里讨论的不朽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生价值问题。”<sup>②</sup>也有人认为，“三不朽”说的价值在于对个体生命的超越：“通过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生永恒的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人士的观念中，带有普遍的意义，始终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sup>③</sup>又如：“司马迁继承发扬的就是‘立言’求不朽的生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注重主体精神的永存，对后来的文士有着极为深远的影

① 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3—1904页。

② 钱逊：《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洛阳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③ 王绍东：《论“三不朽”说对司马迁及〈史记〉创作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响。”<sup>①</sup>顾易生、蒋凡撰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一）则从文学角度肯定其独立的价值，其云：“这里的‘言’主要是指表现于言辞的德教、政治而言，当包括著书立说赋诗作诵。穆叔虽然把‘立言’的地位次在‘立德’‘立功’之后，但毕竟把‘立言’与‘立德’、‘立功’区别开来，肯定其独立地位和垂诸永久的价值。这种认识，常被后世文学批评用来作为讨论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依据。”<sup>②</sup>

一叶知秋。以上所论，基本可代表现今学界对“三不朽”说的认识及评价。显然，诸文所侧重的是个人的“主体精神”、个体的“人生价值观”及“立言”的“独立地位”。这说明，以往的讨论多从其积极意义上肯定“三不朽”的价值，而基本没有顾及分析这一思想其他层面的意义及作用。就承载着“三不朽”的那段《左传》文字而论，它确实包含了以上诸君所征引的积极意义，但这并非全象。笔者认为，理解和分析“三不朽”说，不能脱离其具体语境，就其产生的时代及语言背景来看，“三不朽”说强调更多的是“群体精神”“公天下意识”以及“立言为公”的思想，依附性、群体性、为公性是它的本质规定。换言之，泛言“三不朽”说强调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大体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它所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是附丽于群体的，还是张扬个性的？简言之，“三不朽”说是一柄双刃剑，有其积极的一面，亦有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多是后人抽象、阐扬、叠加的结果，而消极的一面则多蕴含在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就前者而言，古今学界的引用、论证已较为充分；而就后者而论，似乎还少有人提及，尚待挖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而后者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体的原始语境的失落。其一种表现是，在征引文本时，只征引穆叔论述有关“三不朽”的话，而忽略了范宣子之言，如顾易生、蒋凡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另一种表现是，征引时只注意抽象出“三不朽”的思想，而没有

<sup>①</sup> 陈允锋：《汉赋作家的生命欲望及其创作心理特点》，《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3期。

<sup>②</sup> 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